

高等教育美术专业与艺术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书籍装帧设计

主 编 刘文庆 陈 端 王诗彦



ARTS &
DESIGN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C14037699

TS881
73



高等教育美术与设计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书籍装帧设计

SHU JI ZHUANG ZHEN SHE JI

主编：刘文庆 陈 端 王诗彦

副主编：谢 姬 娄建新 李孟宣

编委：罗 雪 李晓丹



北航

C1725849

TS881/7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书籍装帧设计的整个过程,通过对书籍装帧设计的历史和现状的回顾,总结了书籍装帧设计的特征和属性,并对书籍装帧设计的构成元素、书籍装帧设计的基本原则与设计流程、书籍封面、护封的视觉传达设计、版式设计、附件设计等做了较详细的阐述。

通过《书籍装帧设计》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书籍整体设计的知识和设计方法,并可以独立进行书籍整体设计;对学生研究书籍装帧艺术,提高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具有较强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书中引用各国经典图例,有很浓重的文化艺术气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籍装帧设计 / 刘文庆, 陈端, 王诗彦主编. —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05-5874-5

I. ①书… II. ①刘… ②陈… ③王… III. ①书籍装帧—设计 IV. ①TS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2061 号

书 名	书籍装帧设计
主 编	刘文庆 陈 端 王诗彦
责任编辑	李雪姣 柳 晨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5874-5/TS.13

定 价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材中所使用的部分图片,仅限于教学。由于无法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希望作者尽早联系。电话:010-64429065

前 言

图书这一最古老的传媒形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丰富的人类精神，用“精神之舟”指代图书实不为过。从人类的精神史和技术史等多元角度去考察图书的历史，其内在和外在都有着丰富的内容。

中国自古就有“图书”一词，叶德群《书林清话》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古人将书进行整体的精心运筹，使书籍既是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结晶，展示在读者面前，供其阅读和收藏。

书籍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观点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或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形式。从内容出发，运用相应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书的内容性、思想性及艺术性，附带相应的插图进行说明，引领读者的审美艺术情趣。

《书籍装帧设计》一书由东北石油大学刘文庆编著，根据学习知识的习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进行课程教授，提供一个清晰的知识构架：第1章介绍书籍设计的发展文化；第2章介绍书籍装帧艺术的概念；第3章介绍书籍装帧设计的主要内容；第4章介绍书籍装帧设计的元素；第5章介绍书籍装帧设计的基本流程与设计原则；第6章介绍书籍装帧中的封面设计；第7章介绍概念书籍装帧设计；第8章精美的书籍图库欣赏。在主要内容的阐述上，以丰富翔实的图片资料，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书籍装帧设计的内容与形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工学结合、任务驱动、互动式和情境式的教学方法。

《书籍装帧设计》蕴涵了作者多年的设计经历和教学感悟，既可作为高等艺术设计院校及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艺术设计专业人员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给我设计教育的老师和受我指导的学生，带给我设计的思想和设计教育的互动实践；感谢我参考文献的各位作者，使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轻易的居高临下；感谢拿书在手的你可以使我的努力真正实现传播或交流的意义！

目 录

第 1 章 书籍设计的发展文化 /1

1.1 中国书籍设计艺术的历史 /1

1.2 外国书籍设计的发展与流派 /22

第 2 章 书籍装帧艺术的概念 /34

第 3 章 书籍装帧设计主要内容 /40

3.1 书籍设计的主要内容 /40

3.2 书籍的开本与设计 /61

3.3 书籍装帧设计的印刷与制版 /73

第 4 章 书籍装帧设计的元素 /98

4.1 字体 /98

4.2 插图 /103

4.3 色彩 /111

4.4 版面设计形式 /120

4.5 书籍版式设计的形式 /130

第 5 章 书籍装帧设计的基本流程与设计原则 /138

第 6 章 书籍装帧中的封面设计 /148

6.1 封面的构思设计 /148

6.2 封面的文字设计 /151

6.3 封面的图片设计 /154

6.4 封面的色彩设计 /156

第 7 章 概念书籍装帧设计 /158

7.1 精美的书籍图库欣赏 /162

7.2 中式元素风格的书籍作品 /166

7.3 子木书籍设计作品 /175

7.4 国外优秀书籍装帧作品 /176

7.5 学生作品赏析 /180

参 考 文 献 /191

第1章 书籍设计的发展文化

文字是附着于载体的。文字与承载材料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整体，往往被称之为“书”。

在中国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出现了记载、典籍，科技的进步，改变和深化了传播的方式。而早在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00年时期，中国古人就在甲骨、青铜、石鼓、碑文、简牍上记录文字，就有记载和成书雏形；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文字体的演变，又促成了书籍材质和装帧形式的完善；丝绸帛书更是简牍的演义。

世界各地也是用骨、皮、石刻、铸造等手段记载的文献记录。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就有今天存世的莎草纸书；公元前2世纪小亚细亚帕加马城人制作羊皮书传入欧洲，影响深远。古波斯人用木棒在粘土版上写书。古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字写在粘土版上后放在火上烧制成书。古印度人用各种树叶、树皮刻写经文被中国称为贝叶经的书籍。还有腊版、纸草卷、绵、绢等材料，均是在造纸术发明以前所采用的书籍装帧设计制作材料；而书籍的形式也因材料、特定时期和地域的不同，其装帧艺术设计风格发展特异。

书籍出现是最早的信息传播的重要标志，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书籍装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印刷术替代了繁重的手工抄写后，缩短了信息传播的制作周期，从而大大推动和提升了书籍数量及审美的意趣。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逐渐代替简策，为世界带来了文明进步，也为普通民众享用文明传播提供了契机，更是为书籍装帧设计带来了革命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几经演进。先后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简装和精装等形式。

1.1 中国书籍设计艺术的历史

1.1.1 最初书籍的形式

陶文，汉字的远祖。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年—公元前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

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 5500 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是肯定的。

20 世纪末，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黑陶罐，陶罐器表用硬物刻了一个“旦”字图像。“旦”是日出，是太阳从地面升起（如图 1-1-1）。



图 1-1-1 大汶口文化遗址黑陶罐器表“旦”字图像

在我国，距今有五六千年历史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简单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笔画较简单，形状规则，据统计，共有二十多种。基本笔画有竖、横、斜、竖钩、箭头、T 字形、倒钩状、树叉状、乙字形、丰字形等。这些符号，有的是在器物烧成前刻好的，有的是在烧成后或使用过一个时期后刻画上去的（如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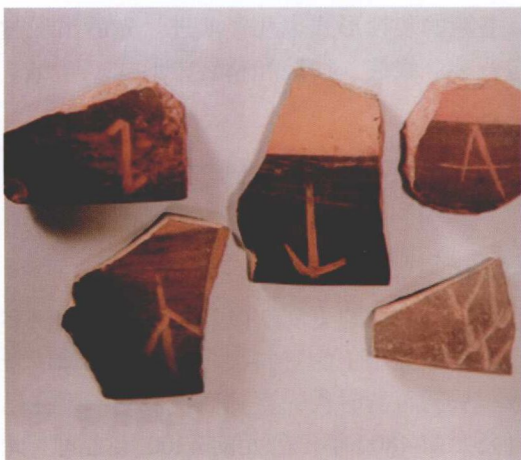


图 1-1-2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郭沫若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于省吾对某些符号文字还作了解释，如“工作X，七作十，十作口，二十作Ⅱ，矛作↑，阜作口，……。”这些刻画符号都有一定的含义，在其他一些如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它们的风格与作法也很相似。有人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当时的象形文字，与其后的甲骨文、金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据学者推断，这可能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也是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迈出的第一步。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现在已知，殷商时期，统治者以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并将文字视为神的文字，在遇到祭祀、征战、田猎、疾病等无法预知的事情时，先人就用笔将文字书写于龟甲或兽骨之上，并用刀镌刻，而后煅烧，通过占卜来寻求来自上天的启示，这就是甲骨文的由来。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镌刻于甲骨上（如图1-1-3）。



图 1-1-3 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殷墟遗址出土）

甲骨文字的排列，直行由上到下，横行则从右至左或从左到右，已颇具篇章布局之美。甲骨卜辞的摆放似乎也有一定的顺序。《尚书·多士篇》说：“惟汝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其中甲骨文“册”字的含义似乎就是甲骨刻上文字后，串联在一起的称呼。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许多龟板穿成册子。”这样穿成的册子便称“龟册”。“典”和“册”的象形，形象地表明了那时的装帧形态。那么，在甲骨上穿孔，再用绳子或皮带把甲骨一片一片缀编起来，是需要技术并具有一定审美水平的，这应该称得上是装帧艺术的源头吧。

青铜器至西周已发展至鼎盛时期。用于记事的铭文常常被铭刻在器物的内壁和器盖的背面。这些关于战争、条例、典礼等政治活动的文字记录之所以刻在金石上，是古人深恐其他材料不能永久保存而使后世子孙不得而知的原故。西周初期的铭文篇幅很短，《青铜太保方鼎》仅“太保铸”三字，而后期的《毛公鼎》则有铭文 490 多字（如图 1-1-4）。



图 1-1-4 西周时期太保方鼎、毛公鼎以及铭文拓片

石刻文字，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在石头上刻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使用的记载方法。

《墨子·鲁问》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证明石头在春秋战国时代，和青铜器一样，都曾经做过文字载体。早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是某种事件的简单记录，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概念，故历来的书史研究者都把它们称为中国初期形式的书籍。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鼓文刻于十座花岗岩石上，因石墩形似鼓，故称为“石鼓文”。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石鼓文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早期石刻文学流传下来的很少，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它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如图1-1-5）。



图 1-1-5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

石鼓也叫“陈仓石碣”、“岐阳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627年发现于陕西宝鸡的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位于珍宝馆内）（如图1-1-6）。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qian mian）、田车、盩车、霤（ling）雨。刻有600多字四言长诗的10个石鼓，当时认为是描述周穆王出猎的场面，后来的考古考证认为是秦穆公时代的作品，有的字已经残缺不全。当时由于尚没有发现甲骨文，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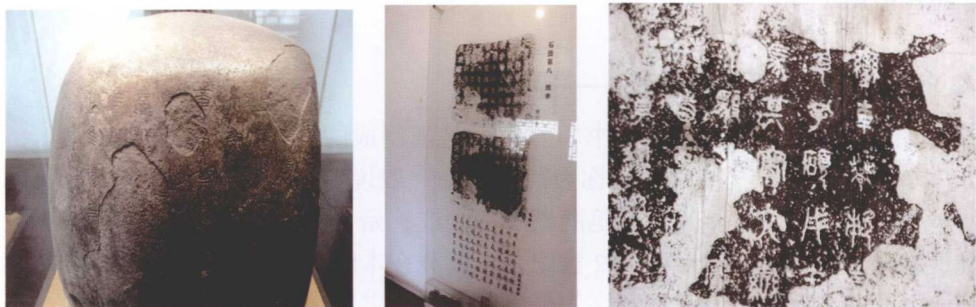


图 1-1-6 石鼓以及拓片

而盛行于秦汉的石刻文字，以碣（在天然形状的石头上刻文字）、碑（在加工成长方形的石料上刻文字，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刻题额，碑身刻正文）、摩崖（在天然的岩壁上刻文字）的形式记录着经典著述与帝王的丰功伟绩，已具有了供大众阅读的功能。

但自东汉雕刻“熹平石经”以来，魏有“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五代有“蜀石经”，直到清代，还刻有“十三经”石碑（如图1-1-7）。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则是地地道道的石头书。其他如房山石经，是释家的石头书。故中国的石刻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刻资料，一类则是石刻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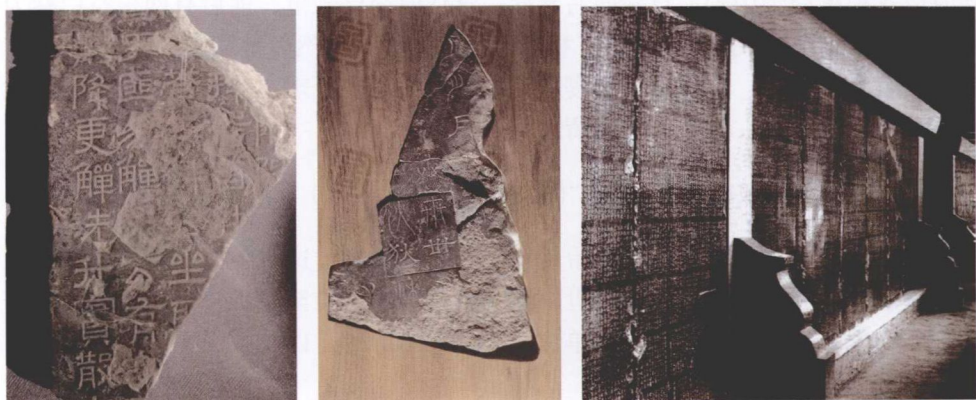


图 1-1-7 东汉雕刻“熹平石经”、魏有“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

1.1.2 书籍的形态

中国书籍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书籍制度进行划分：

(1) 简策制度也称简牍制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周代至秦汉）

(2) 卷轴制度（公元 4 世纪至公元 10 世纪，六朝至隋唐）

(3) 册页制度，其中由卷轴装演变为册页形式，包括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公元 10 世纪至公元 20 世纪，五代至明清，有的形式至今还在沿用）。

1. 我国最早的书籍形态——简牍装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均用毛笔墨书。我国最早的书籍“简牍”，其用毛笔蘸墨书写而成；始于周代（公元前 11 世纪）、盛于秦汉（公元 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记载在木牍上的文字，常被称为“方”或“版”。“牍”，《说文解字》释为：“牍，书版也。”故后人也称“方版”为“版牍”。

把许多简编连起来称“策”，又称“简策”。由于版牍面积大，地图、书信之类在古代常使用版牍，地图因之被称为“版图”；书信因定制为一尺，则被称为“尺牍”。简的长度，一般有三尺、尺半和一尺三种。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 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 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 23cm）。成策的方法是用绳将简依序编连，上下各用绳子一道，将简扎成一束成册。

简背面写上篇名及篇次，当简册卷起时，文字正好显露于外，方便了人们检阅和查找，这可以说明现代书籍扉页的渊源。简册的最后一根简叫“尾简”，收卷时以这根尾简为中轴，自左向右卷起。汉代时简已规范，前后有两根空白称为赘简的简，目的是保护中间内容，相当于现在的护页，然后是篇名、作者、正文。一部书若有许多策，用布或帛包裹，谓“囊”，相当于现在的书盒。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

“简策”和“版牍”统称为“简牍”如图（1-1-8）。

从简册开始，古代的书籍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形制，这对中国书籍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如：后世书籍一直沿袭的自右至左、自上而下的文字书写顺序；现今仍使用的一些书籍单位、称谓、术语等，以及版面上的“行格”形式，都可远溯至此。



图 1-1-8 “简策”和“版牍”统称为“简牍”

2. 历史上应用最久的书籍形态——卷轴装

缣帛，是丝织品的统称，与今天的书画用绢大致相同。缣帛的使用，跨越了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的漫长岁月。在先秦文献中多次提到了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字诂》中说“古之素帛，以书长短随事裁绢”。可见缣帛质轻，易折叠，书写方便，尺寸长短可根据文字的多少，裁成一段，卷成一束，称为“一卷”。缣帛的另一种折叠存放形式，见于 1934 年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楚帛书”（如图 1-1-9），是被折为八叠存放于漆盒内的。缣帛常作为书写材料，与简牍同期使用，自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起，这种形式被书史学家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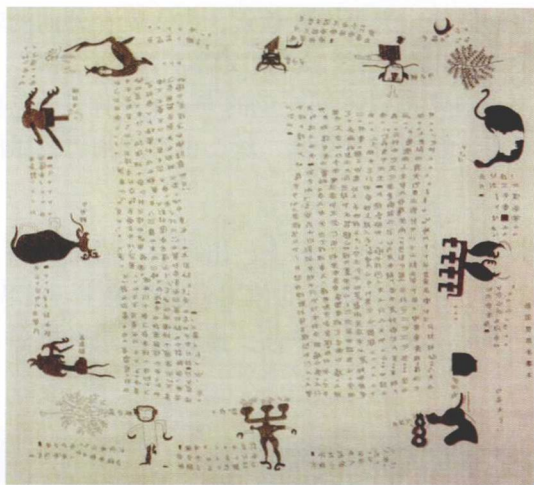


图 1-1-9 楚帛书 四边十二月神像中的四季神像（现存放在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

缣帛的种类也很繁多，写在这些丝织品上的书，也就分别叫帛书、缣书、素书、缙书等。缣帛有许多简牍无法替代的优点，如：书写面积大、易于携带、墨迹清晰等等，但因其价格的昂贵，往往只用于珍贵经典、神圣文书的书写和图画的绘制。书写完成后，便用一根细木棒做轴，从左向右卷起来，这便成为一卷，由此形成了卷轴装的形式（如图 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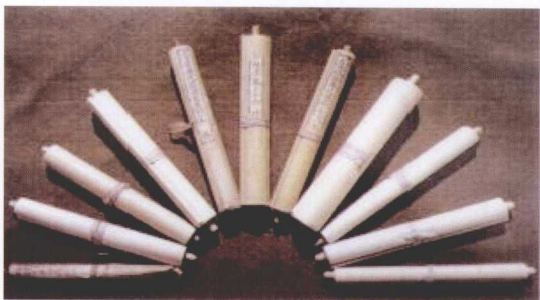


图 1-1-10 卷轴装

卷轴装始于周朝而盛于隋唐（公元4世纪至10世纪）。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有“唐人藏书，皆作卷轴”的记载，可见中国最初的纸本书是沿袭帛书的卷轴装形式。

随着纸的广泛使用，图书传抄的作法相当盛行，对书籍装帧也开始进一步考究起来。卷轴装书卷的末端往往粘在轴上。轴多为刷漆的木轴，也有用象牙、珊瑚、玳瑁、紫檀木以及黄金等贵重材料制成的。当书卷成一卷后，书的卷首就露在最外边，因此，常在卷首以锦缎（一般用纸为多）制成“褭”，也叫“褊”或“装背”，现代人称之为“包首”，来加以保护。“褭”头再系上丝带，作为捆扎之用，叫做“带”，带常为丝质，带的颜色亦因书籍内容的不同而相异。

卷轴装的书是横着插在书架上，一侧的轴头向外，因此，韩愈才有“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的诗句。为了方便检索，古人就向外向的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写明书名和卷数，这叫做“签”。《说文解字》云：“袞（xie），书衣也”，袞即帙字。卷轴的书，通常都以不同花色的书衣（或称帙）包裹保护，每个书衣一般包裹五到十个卷子。帙的材质有麻、丝，也有用细竹帘做的，并在里面衬以绢或布。

纸卷的书通常单面写字，此时卷面上已出现了“眉批”和“加注”形式的注释文字；在卷的末端，也多留有题跋的位置；敦煌遗书（如图1-1-11）中，有的还在卷尾加注抄写日期以及抄写、校阅、监督等人员的姓名，已初具一些现代书籍的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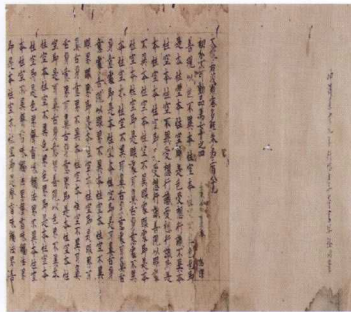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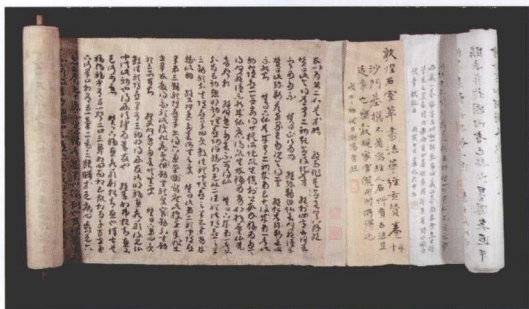


图 1-1-11 敦煌遗书

3. 由卷轴装的册页过渡的册页装形态——旋风装和经折装

梵夹装，古书装帧形式之一。源于古印度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古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酉阳杂俎》卷十八：“贝多，出摩伽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如图 1-1-12）。



图 1-1-12 贝叶经（傣文）

隋唐时期，佛学极为兴盛。大量佛教经典由印度传到中国，都是狭长的单页梵文贝叶经的形式。西藏吐蕃时期古藏文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最初的梵夹装是用于装订已刻写经文的贝多罗树叶。其过程是依次将贝叶经擦好，在其上、下各夹配一块与贝叶经大小相同的竹片或木板，并在夹板中段打两个圆洞，用绳索两端分别穿入洞内，将绳索结扣。在西藏，一般将纸张书写或雕印的经文效仿贝叶经，用木板相夹，而后以绳索、布带捆扎。这种装帧方式主要用于藏文藏经。

不过，梵文是由左向右横着书写的，这种形式和我国自上而下书写的习惯很不相适，因此，就将书写格式改为垂直竖写。一般认为，书籍的发展是由卷轴直接转变为折叠，再转变成册页的形式。实际上，其间还经过了叶子的演变过程。

贝叶经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方式。从现代书籍设计的角度看，贝叶经已具备了现代书籍的雏形，与当时中国的简策装、纸书卷轴装相比较更为先进（如图 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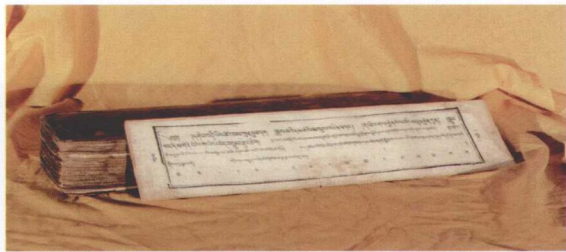


图 1-1-13 梵夹装佛经（清早期 藏文）（93 张 186 面 61*13 厘米 带黄包经布）

经折装。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如果看阅卷轴装书籍的中后部分时也要从头打开，看完后还要再卷起，十分麻烦。经折装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也便于取放。具体做法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的间隔中间，一反一正的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它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在书画、碑帖等装裱方面一直沿用到今天。

斯坦因《敦煌取书记》载：“又有一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可见经折装五代已经出现。特点在单面书写，收展便利（如图 1-1-14）。



图 1-1-14 梵夹装佛经（清早期 藏文）

旋风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旋风装亦称“旋风叶”、“龙鳞装”。唐代中叶已有此种形式。其形式是：长纸作底，首叶全裱穿于卷首，自次叶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其特点是便于翻阅，利于保护书页。

也许是经折装的书很容易散开，或是僧侣们诵经时还有不便之处，在经折装的基础上，人们又不断对它加以改进。古人将一大张纸对折，一半粘在第一页，另一半从书的右侧包到背面，与最后一页相连接，使之成为前后相连的一个整体，如同套筒；阅读时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再到第一页，如此可以循环往复，连续不断地诵唱经文；遇风吹时，书页随风翻飞犹如旋风，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旋风装（如图 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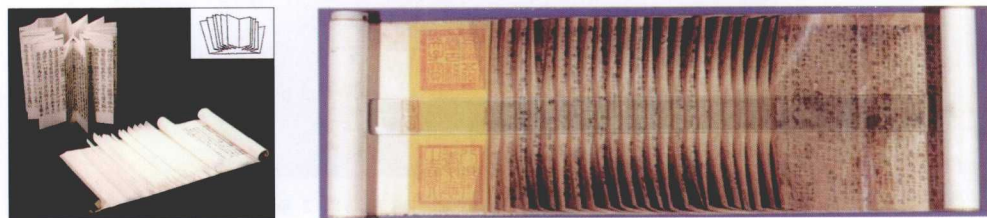


图 1-1-15 旋风装

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关于旋风装的形制，现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书再用一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叶粘起来，另一半把书的最后一叶粘起来，整张纸把书的第一叶和最后一叶连同书背一起包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抄书时，先一叶一叶的抄写，然后再依次序像鱼鳞一样一叶一叶地粘在一张卷轴式的底纸上，收卷时，书页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卷子。

4. 册页的书籍形态——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蝴蝶装, 中国古书装帧形式之一。唐、五代时期, 雕版印刷盛行, 印刷数量的加大促进书籍装帧的发展, 以往的书装形式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印刷业, 促成了书籍形式的演变。蝴蝶装起始于五代(公元10世纪), 盛行于宋代, 至元代(公元13世纪)逐渐衰落(如图1-1-16)。



图 1-1-16 《妙法莲花》纸本, 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 又称“粘页”, 是早期的册页装。蝴蝶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 由经折装演化而来。鉴于经折装折痕处易断裂, 于是书籍形态就转而朝册页的方向发展, 既避免了经折装的缺陷, 也省却了将书页粘成长幅的麻烦。把长长的卷轴改为“册页”后, 将书页从中缝处字对字向内对折, 中缝处上下相对的鱼尾纹, 是方便折叠时找准中心而设的。书页折完后, 依顺序积起方形的一叠, 再将折缝处粘在包背的纸上, 这样一册书就完成了。翻阅时, 书页如蝴蝶展翅, 故称为蝴蝶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说: “蝴蝶装者, 不用线订, 但以糊粘书背, 以坚硬封面, 以版心向内, 单口向外, 揭之若蝴蝶翼。”

蝴蝶装的封面, 多用厚硬的纸, 也有裱背上绫锦的。陈列时, 往往书背向上, 书口朝下依次排列, 因书口处易被磨损, 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如图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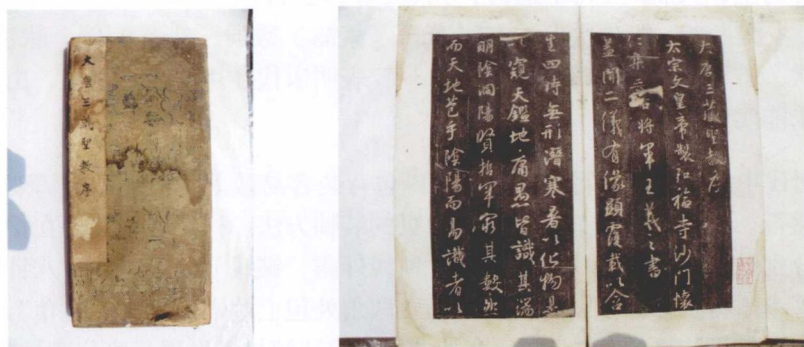


图 1-1-17 清拓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蝴蝶装册页)

包背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南宋后期。社会是发展的，事物是进步的，书籍装帧势必要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改革创新才行。虽然蝴蝶装有很多方便之处，但也很不完善。因为文字面朝内，每翻阅两页的同时必须翻动两页空白页。张铨夫在《中国书装源流》中说：“盖以蝴蝶装式虽美，而缀页如线，若翻动太多终有脱落之虞。包背装则贯穿成册，牢固多矣。”因此，到了元代，包背装取代了蝴蝶装（如图 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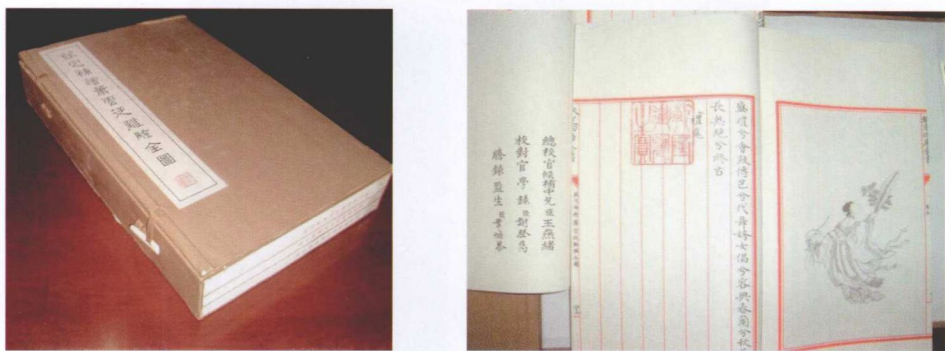


图 1-1-18 白宣线装《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开本，一函三册全，重绢包背装

元代的包背装，是将书页有文字的一面向外，以折叠的中线作为书口，背面相对折叠。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的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包背装的书籍除了文字页是单面印刷，且又每两页书口处是相连的以外，其他特征均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采用的是包背装。

线装，书籍装订的一种技术。它是我国传统书籍艺术演进的最后形式，出现于明代中叶，通称“线装书”。中国用线装订书籍，大约出现在唐末、五代，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绩，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绩之弊也。’”表明宋代还用线装订过书，由于弊病较多，未能实行开来。

到明代中期，书籍的阅读更加频繁，包背装容易散落，不能适应需要，线装书开始盛行。它与包背装相比，书籍内页的装帧方法一样，区别之处在护封，是两张纸分别贴在封面和封底上，书脊、锁线外露。锁线分为四、六、八针订法。有的珍善本需特别保护，就在书籍的书脊两角处包上绫锦，称为“包角”。线装是中国印本书籍装订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最富代表性的阶段。